

红四方面军 入川记 ⑤

红四方面军的西征

黄才畈村位于湖北省红安县上新集镇，地处红安、黄陂、大悟三区交界处。作为红25军的重要活动地，村内至今保存有红25军军部旧址。1932年10月10日清晨，连续三天三夜未曾合眼的红25军军长蔡申熙，在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，村内烈士陵园安葬着蔡申熙等革命先烈。全村在大革命时期共涌现出三十多位烈士，形成“家家有红军、湾湾有烈士”的革命传统。

黄才畈村也是红四方面军作出突围决策的所在地。1932年10月10日晚，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此召开紧急会议，史称“黄才畈会议”。会议决定，留小部分武装坚持游击战争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，在外线调动歼灭敌人，伺机打回大别山。这一决策不仅为红军保留了珍贵的有生力量，也为后续革命斗争埋下了希望的火种。

□文/图 冉奎



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（湖北省郧阳区）。

各一部共6个团遭遇，激战数小时，将其击溃。9日，敌第二师再向河口东北的红军阵地猛攻，红军连续打退其七八次冲击，毙伤其近千人。此时，国民党军第二纵队、第三纵队等部从东、南、北三面逼近，红军始终无法跳出被敌人多路大军牵制、夹击的泥潭。

一场原本可以有所作为的反“围剿”战役，最终因战略上的盲目与傲慢，一步步走向了失败结局。

开始西征

面对国民党大军的步步紧逼，红四方面军连连失利，局势岌岌可危。10月10日夜，在湖北省红安县上新集镇黄才畈村的一间农舍里，一盏油灯发出昏暗的光，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在此紧急召开“黄才畈会议”。经过彻夜激烈讨论，会议最终依据多数人意见作出决定：由沈泽民为书记的鄂豫皖省委负责，在根据地坚持斗争，红军主力则先行跳出敌人包围圈，再杀回马枪回来。

由于情况紧迫，红四方面军总部仅给予一天的准备时间。10月11日，各部队冒雨集结至四姑墩（今湖北省大悟县四姑镇姚家湾）。黄昏，军部和红4军10师、11师、12师及红25军73师4个主力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，分左右两路纵队实施大转移。

“黄才畈会议”召开得很仓促，对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与安排考虑不够周密，广大指战员甚至部分高级干部对此次行动的意图不甚了解。许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行军，未曾想到竟是放弃根据地的开始。这次远征，更像是一场方向不明的西进。匆匆一走，绝大部分再无归期，再无重逢之日。奉命留守的红74师、75师和根据地内的各独立团，并没有停止斗争，11月30日在七里坪檀树岗村倒水河边重组红25军。1934年11月，红25军长征后，留守根据地的红军重建红28军。

10月12日拂晓，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平汉铁路附近。13日，左右两纵队在陈家巷（湖北省广水市陈巷镇）会合。16日，到达鲍家店（湖北省随县均川镇），红四方面军原打算在此与红3军会师，不料红3军已经转移。队伍继续向西前进，到达随县洪山镇双河。

闻风而动的蒋介石调集近9个师50多个团的兵力，对襄阳、枣阳、宜城地区实施包围。敌十师、八十三师及独立三十四旅尾随追击，敌第一师在北面沿襄（阳）花（园）公路、敌四十四师在南面沿京（山）宜（昌）公路平行推进，敌六十五师、六十七师、五十一师沿枣阳沙河展开堵截，妄图一举歼灭红四方面军。

10月19日至22日，红四方面军仓促应战，先后打响乌龙观战斗（今湖北省随县洪山镇桥河村）、新集战斗（今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四岗村）和土桥铺战斗（今湖北省枣阳市环城街道土铺村）。敌人突进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跟前，总部机关人员和警卫、通信部队都投入战斗。红军付出极大牺牲，最终突破重围。

虽然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的计划，但红四方面军并没有改变被动局面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败。此时，返回鄂豫皖苏区的道路已被封锁，红军主力失去了从外线打回苏区的条件，只得向西北方向转移，被迫寻找新的立足之地。

继续西征

南化塘镇隶属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，地处鄂豫陕三省交界，位于丹江和汉水之间，山水环绕、物产丰富。

在南化塘镇胡家岩泰山庙山头，修建有革命烈士纪念碑，这是为纪念在南化塘历次战斗中牺牲的上万名烈士而建。徐向前题写“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”碑名，碑上刻有李先念撰写的碑文。碑文记载：1932年11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，途经南化塘时，全体指战员在徐向前总指挥的率领下与敌军进行了英勇激战，冲破敌人的堵截，胜利转入川陕，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还记载红25军在1934年11月开创了包括南化塘在内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；中原人民解放军在1946年7月17日进抵南化塘时，遭到埋伏在此地和玉皇山一带的敌军胡宗南部的阻击，经南化塘激战，中原突围取得决定性胜利。

11月初，红四方面军主力从河南省淅川县城南涉丹江，由滔河口的张庄进抵郧县梅家铺（今湖北省郧阳区梅铺镇），溯滔河而上，到达南化塘（今湖北省郧阳区南化塘镇）。南化塘虽然交通闭塞，但地形隐蔽，易于藏兵用兵，并且粮食充足，给养有保障；加之红四方面军日夜兼程，连续作战，伤病员日增，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重新建立根据地。总部根据军情、民情、地形研究决定，在此休整，创建鄂豫陕边区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
为此，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电告党中央：“红四方面军现已到鄂豫陕边，当以联合湘鄂西、鄂豫边、陕甘边赤区和红军，形成襄江上游之巩固赤区和红军为目的。”中共中央研究同意红四方面军以南化塘为中心发动群众，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。

然而，部队刚休整3天，正准备开展根据地创建工作，追敌又至。敌四十四师从东北方向扼守化山坪、滔河一线；敌六十五师，从东面压境；敌第一师从南面向南化塘包抄，已进入距南化塘仅10余里的七棵树地区；敌五十一师已占领南化塘东南方向的白桑关、黄柿坪一带。敌人四个师从东、南、北三面合围红军，只留下向西进入陕西一条路。此时，蒋介石已急电陕西杨虎城出兵在漫川关堵击红军。

11月4日，红12师与敌四十四师在鲍鱼岭激战，红11师在化山坪、泰山庙与敌六十五师激战，歼敌一部。5日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放弃在南化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，冲破敌人的堵截后，被迫继续向西转移。

红四方面军转战郧县期间，沿途张贴布告，刷写标语，宣传革命。为协助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，在党的组织安排下，郧县地下党员许致远为红军担任向导，传递情报达半年之久。红四方面军对中共地方组织的工作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。

在南化塘期间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没有借老百姓的房屋，露宿在街头、岩屋以及滔河、洄河河滩上。红军离开后，当地老百姓在柿子树下发现银圆，在红薯地里挖出铜板的事例不胜枚举。红军以严明的纪律、良好的作风，赢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，向往革命的吴荣祥等8名南化塘青年光荣地参加了红军。老百姓激动地说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。

中国工农红军史册中这样记载：红四方面军西行转战的主要目的是创建革命根据地。虽然创建以南化塘为中心的鄂豫陕边区革命根据地、鄂陕边革命根据地的目标未能实现，但是，红军播撒的革命火种，为鄂西北革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，为紧随其后的红25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，为红74师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，提供了重要条件。

黎鎔：达州广安之争及其他

□罗学润

我们渠县在梳理千年文脉、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中，除了似是而非的“西南道家鼻祖”鸛冠子（賁人，游学楚地），少不了要说到北宋经学领袖黎鎔，“黎状元”的传说经久不息。我们参观广安前锋区的黎氏宗祠（状元第）、黎氏邦祥祠堂发现，他们也以黎鎔而引以为傲。去翻看“度娘”的条目，查阅北宋时代黎鎔朋友的诗文集，都是“黎鎔，字希声、广安人”，这让渠县乃至达州人“有点不爽”。

黎鎔，是北宋庆历六年（1046年）的进士而非状元。同年科考“状元郎”贾黯，是河南邓州穰县（今河南邓州）人。但是，黎鎔也很不简单，与苏洵是好朋友，与苏轼、苏辙兄弟是忘年交，与不喜欢《春秋》的“拗相公”王安石唱“对台戏”。不仅有《春秋经解》十卷、《荀子校勘》二十卷传世，而且有欧阳修“文学苏洵、经术黎鎔”的“推荐信”。苏洵去世（1066年）后，宋仁宗下诏召黎鎔为侍讲学士，不带讲义却能滔滔不绝的“黎学士”在国子学“倾倒一大片”。但是，好友苏轼、刘郛却戏称其为“黎襍子”，成就一段文坛佳话。

“政见不合各走各道”，得罪王安石的黎鎔自请外放回蜀，历雅、蜀、眉、简四州，尤以眉州政声卓著，苏轼眉州《远景楼记》可以为证，被百姓挽留“连任一届”。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以“朝请大夫”致仕，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哲宗即位加官“朝议大夫”。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，黎鎔去世。所以，好友吕陶在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为《朝议大夫黎公墓志铭》，称其归葬“广安军渠江县敦义乡书合里书台山下”。黎鎔是达州（渠县）人，还是广安（前锋人）？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，甚至达到了“谁也说服不了谁”的地步。

石碑记载：两地实证的时空对话

1983年深秋，渠县县委宿舍大楼建筑工地的铁锹与石头的撞击声，唤醒了一段沉睡的历史。当泥土被小心拂去，道光年间“黎鎔王平故里碑”得以“重见天日”。这方石碑，将北宋学者黎鎔与三国名将王平并列，是清代渠县士绅对其本地先贤身份的一次郑重确认。

同一时期的地方文献整理中，广安前锋区的黎氏宗祠（状元第）、“黎氏邦祥祠堂碑”进入文史工作者的视野。黎氏邦祥祠堂碑说，鼻祖黎嵩入蜀之广安，谨厚淳朴，以诗礼传家。其孙（应为曾孙）鎔公，字希声，由进士官朝议大夫。其碑还说道，独我祖朝祥公，原产于老孺人，披荆斩棘，破草开荒，创垂斯地名曰“黎家坝”。黎氏宗祠（状元第）追叙的“祖上状元”：黎鎔（宋进士尊为状元）、黎淳（明代1457年状元），为湖南华容人。该宗祠开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完工于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可能是“湖广填四川”来广安的黎氏族人对祖上荣光的“文化记忆”。

两地石碑、两种表述，形成了跨越地理空间的历史对话。这种矛盾不是孤例，而是中国传统社会“籍贯”多重性的典型呈现。要解开这个谜团，需要穿越时间的迷雾，回到黎鎔生活的那个时代。

文献迷宫：宋代户籍制度的复杂图景

吕陶《宋故朝议大夫黎公墓志铭》（《净德集》卷二十二）说黎鎔归葬于“广安军渠江县”。但是，《宋史·地理志》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时空坐标：开宝二年（969年）：置广安军，辖渠江县（从渠州流江县分置）。有资料说：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：罢广安军渠江县，并入渠州流江县（回归）。成书于1080年的《元丰九域志》，却仍在“广安”条下列有“渠江县”。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：黎鎔去世；有资料说：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：徽宗下诏“改流江县为渠江县”。但流江县、渠江县的沿革，均只记载了明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和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的“建制调整”。这个时间序列，也让人“伤透了脑筋”，仿佛“黎鎔是广安人”已是“铁板钉钉”，但渠县人和达州人并不想就此认输呢！

地理实证：山川墓葬的物质记忆

如果文献记载存在解释空间，那么大地上的印记则更为确凿。清代至民国历版《渠县志》的记载，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条：嘉庆《渠县志·山川》载：“大黎山：县西八十余里……其山东麓五里许，小黎山，宋状元黎鎔墓在焉。”同治《渠县志》补充：“碑碣具在。”民国《渠县志》进一步记载了“黎太祖之墓”的具体位置。

原渠县宋家乡（现新市镇）的大黎山、小黎山，“盖以鎔得名”（《渠县志》语），构成了“黎鎔故里”的地理坐标，墓葬、碑碣等不可移动文物的存在，推测出“黎鎔故里”的命名依据。而1983年秋出土的“黎鎔王平故里碑”，则是这种地方历史的物化体现。将黎鎔与毫无争议的本地历史人物王平并列，是清代渠县文化精英建构地方先贤谱系的典型做法。

文脉寻踪：一位宋代士人的地理人生

若将黎鎔八十的人生轨迹绘于地图，我们将看到的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张交织着制度、机遇与乡土情怀的复杂网络。

大黎山下的启蒙岁月在渠州流江县西部的大黎山麓，黎氏家族已在此繁衍生息数代。少年黎鎔在此接受启蒙，“昼耕夜读”可能是他早年生活的写照，“十里楼台五里亭，忽闻花间唤黎声。状元本是天生成，故遣嫦娥报姓名”的苦学故事，在渠县西部的大黎、小黎山水间传扬。

渠县人给出了这样一个说辞：大黎山、小黎山位于渠州流江县边缘，与广安军渠江县接壤。当黎鎔决定参加科举时，选择广安军渠江县作为科举籍贯，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家族决策。相较于渠州，新设立的广安军科举名额分配可能相对宽松；地处渠江下游，交通便利信息灵通。这并非简单的“籍贯造假”，而是在制度允许范围内的理性选择。

进士及第后的黎鎔进入一个全新的身份场域，在汴京的官场社交中，“广安军渠县人黎鎔”成为了他的正式标签。归葬故里，在宋代士大夫的价值体系中，不仅是个人选择，更是家族责任的完成。黎鎔最终选择归葬小黎山祖莹之侧，黎鎔墓葬的确切位置在大黎山与小黎山之间、在祖莹与家族聚居地之间，构成了一个精心选择的地理表达。

黎鎔去世后，关于他的记忆开始在不同层面分化发展。在渠县，地方志编纂者通过记载墓葬、命名山川，将他纳入本地先贤谱系；在广安，黎氏后裔通过修建祠堂、刻立碑石，维系着科举荣光的记忆。到了清代，这种记忆分化达到了制度化高度。

若我们将这些节点连接起来，便会发现黎鎔的地理人生恰如一幅宋代士人的“身份路线图”：从乡土出发，经过制度性身份转换，进入全国性文化网络，最终又以某种形式回归乡土。

考辨方法：多重证据的立体运用

解决黎鎔籍贯争议的过程，至少涉及四重证据：

文献证据的层级分析：从吕陶墓志铭的一手记载，到《宋史·地理志》的官方记录，再到历代《渠县志》的地方文献，以及黎氏族谱的家族文献，构成了完整的文献证据链。同时，明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广安降府为州，渠州降州为县，归广安州管辖，隶属顺庆府（今南充市）。到清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，渠县与广竹县改隶绥定府（今达州市），渠县归属广安州438年后才“脱离关系”，以至于明清修志者，都直记“黎鎔是广安人”。

实物证据的空间分析：墓葬、山川等不可移动文物提供了地理坐标，碑刻等可移动文物提供了文字佐证，而“大小黎山”和“状元坟”等地名，则成为连接人物与地理的不可更改的活态证据。

制度证据的语境分析：还原科举制度中的籍贯规定、行政区划的变迁轨迹、丧葬习俗的文化规范，理解黎鎔身份选择的背景框架。广安军渠江县，是黎鎔的“科举籍贯”和“官场认定”，渠州流江县是黎鎔的“法定籍贯”。

记忆证据的传承分析：地方志的编纂过程、祠堂碑刻的立碑动机、民间传说的流变轨迹，这些记忆建构的痕迹本身就成为研究对象。它们不仅反映了历史事实，更反映了后世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事实。

这种多维度的考辨方法提醒我们，历史真相往往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而是多重线索交织的复杂图景。无论在渠县新市镇的大黎山麓，还是在广安代市镇的黎氏宗祠，家族记忆仍在代代相传。这两处空间，本应是对同一先贤的共同纪念，而非争议的焦点。

结语：共享共荣的发展之光

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这场持续数百年的“故里之争”，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的身份之谜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“籍贯”“郡望”“乡贤”等概念的生动展现。

黎鎔的一生恰如那条渠江：发源于渠县、流经广安、在合川汇入嘉陵江，最终融入北宋的“文化汪洋”。或许，最好的纪念不是继续争论他属于达州还是广安，而是共同思考如何让他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焕发新生。

当我们学会在历史的多重性中寻找连接而非割裂，在文化的多样性中寻找共鸣而非排斥，那些沉睡在时光深处的先贤，才能真正获得新生。黎鎔，不可作为某个地方的“独占符号”，而是作为了解北宋的一扇窗口，是达州和广安乃至所有人都能共享的文化遗产。

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黎鎔不应成为争论的焦点，而应成为共享共荣的起点。在文化旅游作为“支柱产业、民生产业、幸福产业”的当下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贴近四川文化旅游“三个三”（三星堆、三苏文化、三国文化）的发展重点，对接好“三苏文化旅游”、“黎状元”这个文化符号，完全可以照亮达州、广安文化旅游发展的前行之路。